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学术论丛

总主编 黄蓉生

“湖广填四川”与 清代四川社会

HUGUANGTIAN SICHUAN YU
QINGDAI SICHUAN SHEHUI

蓝 勇 黄权生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学术论丛

总主编 黄蓉生

“湖广填四川”与 清代四川社会

HUGUANGTIAN SICHUAN YU QING DAI SICHUAN SHEHUI

蓝 勇 黄权生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总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60 年一甲子,60 年旧貌换新颜。新中国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必将作为人类争取自由解放和文明进步的光辉一页载入史册。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60 年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中央要求,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与实践齐发展,充分发挥了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和学校事业发展的进程,在探索中发展,在改革中前行,不断取得重要成果,涌现出了如吴宓、张敷荣、罗容梓、普施泽、方敬、邓子琴、高振业、孙培良、邓胥功、苏葆楨、刘一层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3 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其中蕴含的深刻理念,不仅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性指针,也为哲学社会科学在新时期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92 年 10 月,学校召开了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意见》,对科研工作的运行机制作了重大改革;明确哲学社会科学要加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研究,加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研究。这一时期,在学科建设方面,获得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 3 个,硕士学位点 24 个,形成了课程与教学论、基础心理学、教育学原理、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一批有影响的优势学科,走出了如熊正瑜、许可经、张宗禹、刘又辛、魏兴南、何剑薰、刘兆吉、任宝祥、杨群章、黄希庭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

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更加强调和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2001 年至 2002 年间,江泽民在北戴河、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关于重视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2004 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7 年 10 月 15 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进一步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提升到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哲学社会科学得到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在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在大力开展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在认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扎实开展学科和教材建设,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发挥了积极作用。在 2003 年至 2008 年间,学校先后两次调整科研政策,狠抓制度建设,强化系统管理,加大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创新意义的重大研究成果。目前,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雄厚,特色明显,涵盖了哲、经、法、文、史、教、管七大哲学社会学科门类的全部学科,基本形成了以教育学、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农林经济管理 etc 为主要特色的学科体系。迄止 2008 年底,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拥有 2 个国家重点学科,3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8 个博士学位授予点,67 个硕士点,1 个专业博士学位点(我国 15 个首批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7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建有 1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1 个重庆市文科重点研究基地。据不完全统计:自重庆市直辖以来,学校先后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500 多项,争取科研经费 8000 余万元,发表学术论文 7000 多篇,出版专著和教材 1500 多部,各类成果获得各层次奖励 220 多项。

实践证明,在波澜壮阔的 60 年中,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间,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教育学、心理学等研究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为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写下可圈可点的辉煌篇章。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进一步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升人文价值,塑造文明、开放、民主、科学、进步的民族精神,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不断推向前进,特推出《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学术论丛》。论丛共七册,它既是学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研究的代表作,更反映了广大哲学社会工作者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中的责任与追求,探索与奋进。

《科学发展观若干问题论析》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黄蓉生教授主编,共分十二个部分,包括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形成、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方位、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以及如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等,力求准确全面地揭示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和实质,做到框架体系独特,内容观点正确,语言文字活泼,是广大青年大学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辅助材料。

《人格科学研究》由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黄希庭教授著。全书由四个部分即“人格科学札记”、“人格研究中国化”、“价值观研究”和“健全人格养成研究”组成。“人格科学札记”论述了人格是一个开放系统及对人格进行系统分析的理论

观点;“人格研究中国化”论述了建立中国人的人格心理学的理论依据,以及我国心理学家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部分成果;“价值观研究”主要论述了价值观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当代中国青少年的需求、成就动机、自我价值感和人生价值观的特点;“健全人格养成研究”集中论述了自立、自信、自尊、自强的幸福进取者的养成教育研究等。本书的主要特点是理论观点和实证资料的有机结合,反映了作者在人格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最新成果。

《重庆抗战诗歌研究》由西南大学新诗所吕进教授等著。该成果认为,目前抗战文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特殊的审美观照方式已经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话题,但抗战诗歌研究与抗战时期丰富的诗歌创作和活动形成了巨大反差,尤其是对抗战文化十分发达的重庆的诗歌研究更显不足。重庆抗战诗歌无论在诗歌思潮的引导上、诗人队伍的组成上,还是在诗歌主题、题材、风格的选择上,早就超越了地域界限,在诗歌史上具有全国意义的内涵,对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对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成果从重庆抗战诗歌的研究现状、时代特色、诗学观念、文体形式以及对重庆抗战诗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协”、七月诗派和诗歌刊物等方面对重庆抗战诗歌做基础性的史学清理和理论研究,从而改变重庆抗战诗歌研究的孱弱现状,以期引起学术界对重庆抗战诗歌的进一步关注。

《回归位育——教育行思录》由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张诗亚教授著。传统教育学认为,教育是单向“适应”社会发展的,或为政治服务,或以经济为中心,或为科学技术奠定基础,这一观念左右了教育政策、教育实践的方方面面。该成果认为,这种观念在理论上与“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不相容;在实践上严重误导教育事业的发展。故针对性地提出“位育”教育观。“位”者“安其所者”,“育”者“顺其生也”。“位育”的秩序强调了环境周围的世界对生命体的规定,而“育”是进步,强调了主体既调整自己,也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进步。故而,从观念上强调了教育与社会的作用;强调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相互作用,而非单向的谁“适应”谁的关系。继而,从实践上划分了位育教育的四个层次:人类与自然位育(即相互作用);人类群体与群体(如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等等)的位育;个体与个体的位育,以期从根本上调整以教育失当为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失当。

《“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蓝勇教授等编著。该成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重要研究成果。该成果对“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过程从环境、移民、老四川文化角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特别是从移民地名、竹枝词中发现了大量移民历史的信息,复原了清代初年的四川社会

经济文化状况,附有“湖广填四川”电视脚本和大量清代移民遗留下来的遗迹照片,是我国在“湖广填四川”移民研究方面将田野考察与计量研究相结合的上乘论著。

《中国西部农村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由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温涛教授、西南大学常务副校长宋乃庆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王煜宇副教授著述。该成果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CGA060067)、重庆市教委重大软科学项目(KJ06CA1)和西南大学农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在深入考察西部地区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基础上,作者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实际效应,揭示了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设计了西部地区农村教育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创新框架,最后提出了适应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教育发展政策。

《中国上市公司的亏损问题研究》由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杜勇博士著。该成果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对上市公司发生亏损的原因和发生亏损后的扭亏途径进行整理和述评的同时,重点对上市公司在发生亏损前的征兆,发生亏损过程中的特质和价值,亏损前、中、后三个阶段中影响亏损公司股价的因素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以期为完善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防止上市公司业绩变脸、提升上市公司业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措施;为规范证券市场行为、提高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使得“壳”资源得到合理优化地配置,从而减少中国股市的投机行为,维护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提出建议和意见;使得投资者能够正确识别上市公司的亏损特质和真实价值,帮助投资者作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

古人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一传统绵延了几千年,从未中断。经过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们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极为有利的条件,作为学校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握正确方向,发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研究阐释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深入研究阐释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以严谨治学的态度打造精品力作,坚定信心,求真务实,继续推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各项工作,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为发展学校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导 言

“湖广填四川”是中国移民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移民事件,不仅对川渝地区近代历史的发展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深深地影响到现代川渝社会。但是,在很长时期内,学术界对这次移民运动的研究却十分薄弱。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写出了《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一书,成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湖广填四川”的学术著作,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

二十多年来,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湖广填四川”作为一次重要的移民运动,自然也成为学术界移民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如袁庭栋的《张献忠传论》,李世平的《四川人口史》,刘洪康主编的《中国人口·四川分册》,蒙默等的《四川古代史稿》,彭朝贵、王炎的《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王纲的《清代四川史》,陈世松等的《四川通史》,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孙晓芬的《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张国雄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刘正刚的《闽粤客家人在四川》、《清代闽越移民台湾和四川比较》,肖平的《湖广填四川》,陈世松和刘义章的《四川客家历史现状调查》,邹一清、刘义章的《四川客家民俗文化》,陈世松的《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陈世松、李映发的《四川客家》,崔荣昌的《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黄尚军的《四川方言与民俗》,谭红的《巴蜀移民史》,何智亚的《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钟永毅的《重庆江津移民与客家》,笔者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等著作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做了研究,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研究作出了贡献。另外,葛剑雄、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中将“湖广填四川”放在中国移民史的大背景下做

了比较研究,为我们全方位认识“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二十多年来,有关“湖广填四川”问题的学术论文也不少,对许多问题都有较深入的讨论。

在这些研究者中,孙晓芬是较早直接关注并研究“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在相关资料的编汇和梳理方面贡献较大;王笛、刘正刚、张国雄等在历史文献整理和分析研究方面较为突出;陈世松、肖平等则从田野考察入手,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史料,而且全方面地研究了“湖广填四川”这次移民运动,特别是对下层的移民社会史的关注对于“湖广填四川”的研究推动很大;另外,黄尚军和崔荣昌从语言文化角度进行了研究,何智亚则从建筑景观修复角度关注这场移民运动。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推动了“湖广填四川”移民历史的研究。

我主持这一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時間已经很久了,其间主要受几个关于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的研究项目的影響,拖延了此项目的結题。这主要是因为长江三峡工程使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的研究在時間上更具有紧迫性。不过,也正因这样,我們有更多的時間来分析、消化“湖广填四川”的一些史料,也有更多的時間来做相关的田野考察。当然,其间同行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已经比我们立项时更深入和全面了。所以,怎样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湖广填四川”做更深入的研究,这就是我們在不断思考的问题。

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我們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湖广填四川”的研究工作进行新的探索。

第一,在研究资料上,“湖广填四川”的资料除了传世的历史文献外,许多资料都藏于民间,如民间的家谱、口碑、实物资料对于“湖广填四川”的深入研究特别重要,所以我们有意将资料收集的重点放在这些方面。就传世历史文献而言,我们也尽可能对以前学者注意不够的资料加以利用,如丰富的四川竹枝词和清代移民墓碑。同时,我们也十分关注四川地名中蕴涵的“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信息。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我們力求将清代“湖广填四川”以来,直到现代川渝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一个明晰的梳理,以期让我们能对现代川渝文化的历史轨迹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认识。为此,早在20世纪末,我就首先提出了“老四川”

地区、四川三大人群的概念,我认为这两个概念对于认知近三百年来川渝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影响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后来陈世松的《天下四川人》一书沿用三大人群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三分天下四川人”的概念,并被广泛使用。本书也是想进一步对这些问题做更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湖广填四川”研究最薄弱的部分应是田野调查不够深入和全面。目前对“湖广填四川”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对客家人的社会调查和对四川方言问题的调查方面。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有说服力,2003年和2004年暑假,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生曾分别到四川省通江县八家坪村和重庆市巫山县起阳乡进行了两次“湖广填四川”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个案调查,力图通过对这两个自然村落的移民与开发的历史过程来透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探索其对民间影响的深入程度。另外我们也十分关注“湖广填四川”留下的独特景观建筑——移民会馆,在数十次的田野考察中都将其作为重点来考察。同时,我们发挥历史地理学科长于计量分析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将历史文献的定性记载与统计计量分析结合起来,使人们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认知更全面更深入,以体现我们提出的“尽全时空”的学科特色。

第四,在研究目的上,我们一直认为历史研究应该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移民历史的研究与现实关系密切,在研究过程中就更应如此。这些年在研究“湖广填四川”的同时,正是巴渝大地实施三峡大移民的时期。对历史上的移民运动与当代移民运动的思考的碰撞,使我们辗转反侧,夜不成寐。所以,我们提出现代三峡移民的回故乡之路,实际上是回到三百年前他们祖先“湖广填四川”时的迁出地,这好似一个三百年的历史轮回。对这个轮回的思考,使我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三峡地区应该在大量移民外迁的基础上发展林牧业和旅游业。从政策上来看,1998年后的退耕还林、三峡移民从后靠到外迁的转变,直到今天重庆作为城乡统筹特区,其基本政策思路与我们通三峡古今之变的感悟是一脉相承的。这无疑说明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是真正能够为现实提供参考借鉴的。

“湖广填四川”是一个与现代川渝人关系十分密切的移民运动,四川、重庆地区对“湖广填四川”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所以,近些年我们做了一些“湖广填四川”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本书附录的电视剧本、报纸上的文章以及我在重庆电



视台《重庆掌故》中的讲授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本书中《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研究》、《清代四川土著与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老四川区域的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及附录(三)《回故乡之路》部分由蓝勇撰写;《“湖广填四川”与四川地名研究》、《从竹枝词看清代四川的移民社会》(该部分也是黄权生主持的湖北省人文社科基地三峡大学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开发基金项目《三峡地区“竹枝词”与三峡社会风貌研究》[编号 2007KF16]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及附录(二)《“湖广填四川”移民传说故事释读》部分由黄权生撰写;《“湖广填四川”后修谱传统对近代四川教育的影响研究》部分由黄权生、罗美洁共同撰写;附录(一)《“湖广填四川”电视拍摄脚本》由蓝勇、黄权生共同撰写;附录(四)《“湖广填四川”照片集》除注明外,均由蓝勇拍摄。在研究中我们对一些问题还存在一些分歧,因是一部专题著作,故我们尽可能各抒己见,好让同行与读者以后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总的来说,这本书仅是对“湖广填四川”的某些层面的研究。如果这本书能为大家进一步系统研究“湖广填四川”提供一点点参考和借鉴,我们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蓝 勇

2009 年 9 月

目 录

导 言	1
一、“湖广填四川”综合研究	1
(一) 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研究	1
(二) 清代四川土著与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	7
1. 清代中后期四川土著与移民的比例问题	7
2. 清代四川土著与移民分布的地理差异	9
3. 清代四川移民籍贯的地理分布差异	15
(三) 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	25
1. 移民会馆名实考	26
2. 移民会馆职能研究	30
3. 移民会馆的消失	39
附表一 清代四川移民会馆统计表	41
附表二 清代贵州移民会馆统计表	45
附表三 清代云南移民会馆统计表	47
(四) “湖广填四川”后修谱传统对近代四川教育的影响研究	49
1. 清代四川修谱兴盛的背景	50
2. 家谱在清代四川社会教育的地位与功能	54
3. 家谱蕴涵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56
(五) 老四川区域的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61
1. 老四川区域的文化特征的形成过程	62
2. 川南居民的个性特征与老四川分区	67
3. 老四川区域形成的历史原因	68
二、“湖广填四川”与四川地名研究	71
(一) 四川“湖广填四川”移民地名时空统计分析	71
1. 从四川移民地名看清代四川土著遗存问题	73



2. 四川移民地名空间比较分析	93
(二) 移民地名中移民省籍动态信息复原探讨	103
1. 移民地名体现的“五方杂处”、“半潇湘”分布	105
2. 造成“五方杂处”、“半潇湘”移民分布格局的原因	108
3. 明清湖广籍移民比例探讨	112
4. 移民地名蕴藏的移民动态信息复原	119
(三) “湖广填四川”社会经济与生态效应的地名学研究	129
1. 地名学是研究移民与生态的重要手段	129
2. 移民初四川地名反映的生态状况	133
3. 四川地名反映移民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生活情况	138
4. 地名的信息体现的森林与人类的依存关系探讨	148
(四) 重庆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	159
1. 重庆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	160
2. 移民地名中移民省籍的统计分析	165
3. 川东移民地名蕴藏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动态信息复原	168
附表一 重庆地名附表(1~3)	174
附表二 四川地名附表(1~19)	176
三、从竹枝词看清代四川的移民社会	186
(一) 从竹枝词看“湖广填四川”“半楚”的表现和影响	186
1. 从竹枝词看清初四川移民运动的自然环境	186
2. “湖广填四川”移民迁入方式	189
3. “湖广填四川”中移民的分布格局	194
4. 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对新的四川文化形成的影响	198
(二) 从竹枝词看“湖广填四川”后的“四川话”	203
1. 竹枝词反映的移民五方杂处和乡音各异	204
2. 竹枝词反映移民后的语言文化整合	207
3. 四川语言“半潇湘”是四川文化形成的标志	211
(三) 从四川竹枝词看清代四川(巴蜀)服饰的嬗变	213
1. 清代四川尚服饰状况与自古尚奢习俗的传统	213
2. 清代四川纺织业兴盛与四川服饰之兴	215
3. 清代四川服饰折射的社会现象	216

4. 清代四川服饰特征形成的原因探讨	218
(四)从竹枝词看清代移民后四川的产业发展	222
1. 从竹枝词看四川在移民后的总体经济特点	223
2. 从竹枝词看四川移民后的其他各产业发展	226
(五)从竹枝词看清代移民与四川饮食、民居与交通	235
1. 从竹枝词看清代移民后四川的食(吃)	236
2. 从竹枝词看清代移民后四川的住(居)	243
3. 从竹枝词看清代移民后四川的行(交通)	246
(六)从竹枝词看清代移民后四川节俗与宗教信仰	248
1. 从竹枝词看清代移民后的四川节俗	248
2. 从竹枝词看清代移民后四川宗教信仰	261
四、附录	266
(一)“湖广填四川”电视拍摄脚本(八集历史文化专题片)	266
引子	266
第一集 衰败与再生	267
第二集 麻城孝感现象	271
第三集 漫漫迁徙路	273
第四集 会馆与祠堂	275
第五集 垦殖的获与惑	280
第六集 贸迁与会馆	282
第七集 四川与老四川(上)	284
第八集 四川与老四川(下)	287
尾声	290
(二)“湖广填四川”移民传说故事释读	291
1. 移民入川的缘由的传说与解读	291
2. 移民后移民间斗争的故事	300
3. 移民后社会发展的故事	313
(三)回故乡之路——“湖广填四川”与三峡大移民	325
(四)“湖广填四川”照片集	329

一、“湖广填四川”综合研究

(一)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研究

明末清初的四川战乱酷烈,有称“三百年江山自此残破”。战乱以后,四川人口耗损,社会残破,经济凋敝,田里荒芜,其残破景象的记载不绝于史籍。清代大量的地方志对于这个时期的记载多是人口“靡有孑遗”、“人烟断绝”。以往记载清初四川人口仅 18000 多丁口,但现在的研究表明,清初四川人口应在 60 万左右。^① 这 60 万人口仅相当于现在四川一个中等县的人口数。在四川如此大的面积中只存在如此少的人口,其景象确实是十分荒凉的。但是,不论是清代的地方志,还是现在史学家的有关论述,都是用一种比较模糊的语言来描述这段时期的环境,作为其论述的背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论述方式是有待完善的。故笔者在此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个时期的环境,尽可能地用计量方法复原这个时期的环境状况。

要复原这个时期的环境状况,最好能获取一个清代初年的生物参照物作为基本的定量标准。笔者在大量阅读有关地方史籍过程中发现,清初四川发生了历史时期以来最为酷烈的一次虎患,是这个时期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按照现代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华南虎主要栖息于海拔 3000 米以下的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浓密灌木丛中,是一种较典型的森林动物。历史时期中国西南华南虎栖息的地区一般要求森林覆盖率在 50% 左右。^② 这样,以华南虎出现的状况便可以相对准确地复原当时的环境状况了。

清初四川虎患遍及整个四川地区,虎群之多,出入范围之广泛,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严允肇称清初四川“至今劳生聚,人少豺虎多”,确是当时景象的真实写

① 蓝勇:《乾嘉垦殖对四川农业生态和社会发展影响初探》,《中国农史》1993 年第 1 期。

②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13 页。



照。其实有关清初四川虎患的记载是十分多的,如:

清康熙年间王士正《陇蜀余闻》中谈到:“蜀多虎。”

赵彪诏《谈虎》:“蜀雨后山行虎迹去来可数。”

佚名《鹿樵记闻》:“所在蒿莱满目,狼虎成群。”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10:“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穿屋逾颠,逾重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且毙,即弃去,又不尽食也。荒城遗民几百家,日必报为虎所暴,有经数十日而一县之民俱食尽者。”

彭遵泗《蜀碧》卷4:“(虎)白昼入城市,遗民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往数日而县之人俱食尽者。”

费密《荒书》称四川顺治四年后:“虎出为害,渡水登舟。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

以上是有关四川虎患的笼统的记载。如果分地区来看,当时的虎患状况就更加明确了。

成都平原地区:成都平原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也是明末清初兵燹破坏最严重的地区。清初王培荀云:“顺治十六年,重经恢复,城中草木蔽寒,麋鹿豺虎,纵横民舍,官署不可复识,中官栖于城楼,兵则射猎于城内,蜀王府野兽聚集,二三年捕获未尽。”^①方象瑛也谈到成都城内“虎狼且攫人”。^②蜀王府在今成都展览馆一带,当时为四川官府重地,其残破景象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其时成都平原上的汉州、新都、温江、新津虎患也同样酷烈。王培荀记载:“温江刘春开,国初云骑尉。致仕,居石家庙旁,庙倾圯,介修,功竣入寺,闻林中有虎,在出食人。”^③方象瑛也谈到汉州、新都一带“虎迹遍街”,^④陈奕禧则称汉州“成虎狼之窝”,^⑤王士正又称新津“虎迹纵横”。^⑥从以上记载来看,当时成都平原华南虎的出入是十分寻常的。

重庆地区:重庆地区有许多深丘地区,历史时期也是虎患较酷烈的地区。在明清时期,重庆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明代出现的进士数居四川的第二位,已是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明末清初其地受战乱的侵扰也很大。这样,在顺治

① 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1。
② 方象瑛:《使蜀日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③ 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7。
④ 方象瑛:《使蜀日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⑤ 陈奕禧:《益州于役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⑥ 王士正:《蜀道驿程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三年便出现了“疫复有虎患，重庆当流贼残杀之后，几不遗民，五年戊子大旱，群虎白日出游”。^①直到康熙四十三年，缙云山、綦江以南诸山虎群出没寻常，^②在康熙四十三年和乾隆三年还发生了虎闯入城区的事件。^③康熙初年张安弦《江涨》一诗便称重庆一带“村荒虎豹哀”；王士正在《泊木洞驿》一诗中称：“人多虎不骄”，言外之意，其他人少之地虎仍出入骄横。

四川盆地北部地区：川北地区在明末清初是最重要的战场，可以说是饱受战乱的摧残，所以清初保宁、顺庆、潼川三府虎患最为酷烈。有载，清初川北地区“城市鞠为茂草，村疃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噬”。^④赵彪诏记载：“蜀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猘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甚。”^⑤康熙二十年，广元“县东百里外恶虎食人，虎迹一足如人，足长可盈尺”。^⑥康熙十九年前，虎入城一直是三台县县城士民的忧患，盐亭县在顺治年间“城外壕间有四虎为害”。^⑦康熙初年王士正沿金牛道南下四川，经过川北地区，对川北地区的虎患感受十分深刻，亲身经历，十分可信，其记载说：“（盐亭富驿）今豺虎窝耳，窗外即荒山，虫声四起，夜不成寐……（三台秋林）蛇虎虽多，与人无害……（三台建林）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⑧康熙初年，陈奕禧也记载：“（盐亭）十里埡见虎……（三台秋林）终夕群虎逐鹿，鸣声绕床不绝。”^⑨

四川盆地中部地区：四川盆地中部地区以浅丘地形为主，农作较发达，但也是虎患大作。欧阳直曾谈道：“予自内江奔出，月下见四虎狂奔，匿草间以免。”^⑩清初荣昌县知县张懋赏主仆八人到县城赴任，“方入城，蒿草满地，不见一人，日未暮，群虎拦至，攫食五人”，^⑪可见该县之凄凉恐怖之状。富顺县“数年断绝人烟，虎豺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郊村廛之内，不见一人驰之。其胆亦张，遇人即

① 道光《重庆府志》卷9。

② 民国《巴县志》卷19。

③ 道光《重庆府志》卷9。

④ 《明清史料·甲编·六本》顺治七年《四川巡按张璠揭帖》。

⑤ 赵彪诏：《谈虎》，西南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⑥ 乾隆《广元县志》卷8。

⑦ 乾隆《潼川府志》卷3。

⑧ 王士正：《蜀道驿程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⑨ 陈奕禧：《益州于役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⑩ 欧阳直：《蜀乱》，成都茹古书局本。

⑪ 顾山贞：《客滇述》，《痛史》本。

樱,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焉。残黎之多死于虎,又一难矣”。^① 营山县在“顺治七年,人民稀少,虎患大作,昼夜为害,凡耕作必会集,方敢偕作,然其来疾于掣电,往往攫人于广众之中、同榻之上”。^② 清初与乐山城紧邻的凌云山上也是“泥中虎迹交错于路”,^③难怪有称仁寿县“虎出老山,国初最盛”。^④

四川盆地南部地区:四川南部长江沿岸地区在明清时期是一个重点开发的地区,经济发展十分快,但经过战乱,虎患也十分酷烈。从现在的史料来看,清初四川的虎患首先是从川南兴起的。刘石溪《蜀龟鉴》记载:“(虎患)始于川南,至川西北而川东、下南尤甚。”^⑤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顺治)八年辛卯春,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虚日乃闻川东、下南尤甚。”清初欧阳直谈道:“叙南舟行,见沙际大虎成群。过泸州,岸上数十(虎)鱼贯而行。前一白虎,面长毛颈按发径尺。”^⑥可见虎患之严重。江安县康熙三十九年“县北阳春坝猛虎为灾”,^⑦南溪县“雍乾时各乡时有虎患”,^⑧长宁县则“郊外昔茂林丰草,屢多虎患”。^⑨直到乾隆四年庆符县“虎食人不能制,县令杨元理出示,令民间火枪、弓弩逐之,得虎数十,余患遂息”。^⑩綦江县在顺治五年“群虎白日出游,下城楼阙破残人户”,顺治六年“虎狼之害愈虐,行者虽五七同群,执器械前后,中间必有一失”。^⑪清初江津县则为“虎狼之穴,翻屋登梯,号为神虎”,^⑫彭水县在顺治年间也是“虎昼攫人”。^⑬

欧阳直《蜀乱》称:“(清初)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浮水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确实是当时四川地区虎患的真实感受。清初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称当时招抚人丁 506 名,结果被虎吞食了 228 名;后新招 74 名,结果又被虎吞食了 42 名,进而感叹道:“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

① 乾隆《富顺县志》卷 5。

② 同治《营山县志》卷 27。

③ 王士正:《蜀道驿程记》。

④ 同治《仁寿县志》卷 2。

⑤ 刘石溪:《蜀龟鉴》卷 3,裴氏家藏刻本。

⑥ 欧阳直:《蜀乱》。

⑦ 民国《江安县志》卷 4。

⑧ 民国《南溪县志》卷 2。

⑨ 嘉庆《长宁县志》卷 12。

⑩ 光绪《叙州府志》卷 23。

⑪ 道光《綦江县志》卷 10。

⑫ 民国《江津县志》卷 3。

⑬ 光绪《彭水县志》卷 4。